

“合”与“散”的尴尬： ——庞德的文学理论观一瞥

□付江涛 [河南大学 开封 475001]

[摘要] 美国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常常被指责其关于“合”与“散”，“统一”与“多样”，“单元化”与“多元化”的概念混淆不清，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文学、政治、经济和宗教等方面悖论式的理论阐释及其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庞德的这种尴尬可以通过其表意图形文字的运用以及理论得以化解，最终得知庞德的“合/散”悖论实为一种对立统一的形式。

[关键词] 庞德；合与散；悖论；表意图形文字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1)01-0080-03

一

作为前卫派的领军人物，庞德对现代主义的诞生功不可没，这被他自己视为诗人的分内之事。然而这是一个复杂的时代，处处充斥着繁复的碎片与断裂，可以说时代本身即是一个最大的悖论。增熵、紊乱的大环境使得许多卷入“日日新”运动的英才们不知所措，完全走进离奇的、矛盾的死胡同中来。庞德本人也不例外：穷其一生，备受争议。无论是审视庞德的文学创作理论观念，还是探讨其颇具戏剧性的政治经济理念，都不难发现盘根错节的有形与无形之间的对抗，单一（元）与多样（元）的冲突。那么如何来理解庞德这种悖论式的观点就成了化解“合”、“散”尴尬的关键。下面我们将从若干层面来寻找这种矛盾化解的契机。

二

首先分析一下他的文学理念。庞德的名著《诗章》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有机体，想要走进他的“诗章”绝非易事，它对于读者的语言功力要求颇高，即便是谙熟（古）英文的人，还要了解当代的插科打诨以及各种口头禅。更令人头痛的是文本中时时穿插的德、法、意、中等二十多种语言文字。这种大伤脑筋的阅读任务令大众叫苦不迭。就连著名刊

物《诗歌》的主编哈里特·门罗都说：“我读了两三百页埃兹拉的《诗章》然后就病了——毫无疑问它就是病因。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脑力去读它了。”^[1]由此可见，它对普通读者的挑战是巨大的。《诗章》疏远了与大众的距离的另一个原因是由庞德所选“主题”和“内容”造成的。它仿佛一个万花筒，其间涵盖着无数的历史、文化、人物、习俗等。东西方的神话典故荟萃，跨时空跨地域的文人骚客汇聚一堂。战争、典籍、音乐所有多元的因素掺杂在一起，组成了一幅充斥着碎片的史诗巨篇。不得不承认，若要大众接受《诗章》实属难事。有评论家称其为“一堆活动的裂片”^[2]，甚至说它是“毫无统一主题的怀旧蒙太奇，多种体裁糅合的冒险传奇”^[3]。究竟庞德如此这般的创作意图何在？是否《诗章》就是无形无实的“散”文汇集呢？庞德自己在《诗章》中说道：“我无法使它连贯紧凑”^{[4]796}。这读起来颇像是庞德在为自己史诗的连贯性上的失败而懊恼，由此推断早在动笔之前庞德应该就已经制定了一个稳固的“形式”以便于贯穿全文。在1927年给父亲的一封信里，庞德透露了自己的三部曲格式：“恐怕这首诗很晦涩，全是碎片。我给过您主要内容的提纲没有？或者类似的东西？”^{[5]210}这说明尽管庞德未能成功地制造出所谓的“形式”，但他从未停止过这种追寻。形式所散发的美对于庞德来说就在于良好的“秩序”，而艺术本身的功用即是“将事物合并

[收稿日期] 2010-09-22

[作者简介] 付江涛（1978-）男，博士研究生，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师。

成整体”^[6]。早在庞德文学旅程初始就怀揣着这种信念,在《希尔达之书》中,他把艺术家想像为“搜集碎片、一片也不遗漏”^[7]的人。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庞德视艺术为“聚合”碎片,组成“形式”的过程。此外,他在《新世纪》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我搜集奥斯里斯的四肢”。这里的“我”指的是伊希斯^①,正是她试图去搜集奥塞里斯零散的尸体碎片,并执意将其拼回原形。透过这种对“合”的迷恋,不难理解庞德在开始史诗《诗章》写作前对“形式”的深思。然而,如果仅仅认为庞德钟情“合”,那就未免有失公允了。其实他常常把“装碎布的袋子”这句话挂在嘴边。他自己曾经说:“我就是个装碎布的袋子,看到了不少,记下了不少,可我不会为了某种模式而打压生活。”^[8]这番话说明庞德对《诗章》的预期形式毫无头绪,只不过是找到一些零散的碎片“拼凑”而已。这一点在他给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的信件中展露无疑:“至于《诗章》的形式:我只能说或者祈祷:等写完了再看看吧。我的意思是等写完了再说,如果到时候还看不出来,那我就加注释。”^{[5]323}事实如此,《诗章》既不具备完整的情节,也没有中心主题,如此松散的并置结构根本不足以包容这么繁杂的碎片,并且从传统定义角度考虑,也不符合“史诗”的结构要求^②。

其次,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庞德的宗教观。庞德一向憎恶一神论,故此对基督教十分厌烦。他对基督教以及其他制度化的宗教均怀有敌意。在评价阿伦·厄普沃德作品时,庞德说道:“所有的国立教会都有失礼仪风雅,它们就像中世纪末僧侣的便便大腹一般令人生厌。”^{[9]410}于是庞德主动寻找替代物,最终选定了儒教。在给老父的信中,庞德大肆歌颂孔子,说他比圣保罗好得多。庞德憎恨一神教,因为它强迫人们遵循统一的制度,抹杀了人性。而儒学的“兄友弟恭”思想却强烈地吸引了他。与一神论相悖,孔夫子强调“个性”的价值。在《诗章》第十三章中,孔子第一次露面,伴随他的是弟子求、赤和说话细声细气的点。尽管穷愁潦倒、默默无闻,孔子还是假设有王侯来请教问题,让学生们作答。当时弟子们的答案不一^③,这充分显示了孔夫子在教导门徒时倡导独立思维。在曾皙询问谁的作答正确时,孔子答道:“他们都答对了,也就是说,各自遵照各自的天性”^{[4]58}。孔子的答案彰显了人性,冲破了一神论独裁压制的羁绊,也正是时下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所体现的民主意识。可以说庞德就是在儒家思想中找到了突破单元与多元尴尬的妙法。

再次,庞德的政治观点也值得我们剖析。从孔

子那里,庞德学会了统治者应先治其身再治天下。庞德认为,这里的“治”即是规矩、秩序,是一种强调统一性的行为。庞德眼中的墨索里尼是个明君,他认为“领袖不会与暴君和权利挚爱者为伍,只会与‘治’者同在”^{[10]128}。可惜这种观点被庞德误用,放在了墨索里尼的身上。他错就错在过于强调个人的“治”,而将其凌驾于他人之上,这样极其容易误入歧途,从而强制大众随从。这便导致后来他误以为法西斯政权是良好秩序的“治”。想要理解庞德这种前后矛盾的心理不太容易,如果他真像前文所说极力反对一神论(即高度统一的制度化),那么他后期的法西斯倾向就不应该发生。那么导致这种戏剧性结果的最大可能即是庞德孜孜不倦追求的“个人性”,为了能够实现这个梦想,他不惜一切代价。如其所言:“基本上,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只在意文明。我不管谁来收税,谁来维持治安。人性是个体的集合,不是整体切割成的独立单位。唯一重要的事便是什么能使个人生活更有趣。”^{[9]199-200}到此读者便不难理解庞德的尴尬了,说到底就是他太不顾一切地要维护“个性”所致。为此,他付出了巨大代价。蒙蔽的事实使他误以为墨索里尼才是真正的“艺术家”,陷入了“聚”与“散”的混沌漩涡。

然后,是庞德的经济观。庞德十分推崇经济学家C·H·道格拉斯的社会信用制度,认为货币流通是危机的症结。普通大众把辛苦节省的钱存进银行,这样一来生产商们的多余产品就无法销售。生产与货币之间的平衡打破了。而银行家(以犹太人居多)大量聚敛钱财用以发放高利贷,个人的利益与大众的平衡破坏掉了。这种聚敛钱财(“合”)的行为导致了庞德的仇犹心态,也成为他解释战争在所难免的理由。庞德对如何推翻这种“合”做了大量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借鉴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金融改革家西尔沃·格塞尔的观点,认为货币不是像黄金一样的稳定商品,而是政府根据国家生产力和需求关系所发行的随时调整的东西。要想彻底解决敛财(“合”)的问题,可以效仿奥地利沃格尔市的先例。在那里,格塞尔式的货币改革政策有效地阻挡了经济大萧条的入侵。1932年,沃格尔市的市长昂特古根伯格决心消除该市35%的失业人口。他发行了相当于奥地利14,000先令的“邮章货币”,这种邮章货币由当地银行储存着的同样数量的普通先令担保。为了使这种“地方性通货”生效,每月需要在货币上盖一个邮章(即买“邮章货币”面值的1%的邮票)。因为买邮票的成本是持有这种通货的使用者的费用,每个人都想迅速地消费掉“邮章货币”,因此这自然而然地就为其他人提供了工

作。两年以后,沃格尔成了奥地利实现全部就业的第一个城市。庞德认为依靠这种活跃经济的政策,至少可以保证货币不再成为高利贷的工具,自然“统一性”也就销声匿迹了。

三

纵观以上各个侧面,不得不承认,庞德的“合”“散”冲突贯穿于他生活、思想当中。如何来理解这种尴尬?是他的概念混淆不清,还是另有蹊跷。也许通过对庞德的文学实践观的透视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个难题。庞德对“合”的排斥很可能开始于其修订东方学者芬诺洛萨的文稿。通过整理芬诺洛萨遗孀送来的遗稿,庞德对汉字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并整理出版了《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一书。在这本书中,庞德吐露了自己对汉字这种表意图形文字的惊叹,认为它是诗歌最好的媒介。实际上对表意图形文字的解释有助于我们揭开庞德悖论之谜。1940年,庞德致信乔治·萨塔耶那,期间提到了汉字“红”的构造:

“红 樱桃
铁锈 火烈鸟”^{[5]33④}

几个部分(部首)共同组成的,具有实在意象的“红”字充满着诗意,既符合了庞德意象的追求,也体现了“个体”(零散碎片)的并置(“合”)。在庞德眼中,汉字是自然的文字,绝对杜绝抽象,是实实在在的。汉字中所有的意象叠加(从“散”到“合”的过程),既保证了所有全异因素的个体多样性,又通过有“秩序”的结构形式体现了完整、连贯的意义。换句话说,庞德通过表意图形文字建立的“合”体并没有以牺牲零“散”个体的多元性为代价,而是更好地完善了它们,保留了原意。这究竟是庞德的本意所在,还是我们的臆断,恐怕目前无法盖棺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庞德的文字观与他各种思想是融会贯通的。文字作为写作和语言的主要媒介,在庞德看来,就是和货币一样是某种写作形式。庞德推崇福楼拜的“le mot juste”^⑤,即是英文中的“just word”。同理在经济上,庞德追寻的也是“just price”^⑥。正如安德鲁·帕克在《埃兹拉·庞德和〈反犹太主义经济〉》中提到的那样,庞德所憎恨的“犹太人”实际上就是“糟糕的写作”。故此,“合”还是“散”,对于庞德而言,早已不再是个问题!

注 释

①伊希斯(Isis):古埃及守护死者的女神,亦为生命与

健康之神,也是婚姻的守护神,还为母性之神,她所支配的水之领域象征着代表生命之源的古老河流。她是奥塞里斯(Osiris)的妹妹,也是他的妻子,是努特(Nut,天空女神)和格伯(Geb,大地之神)的女儿。

②史诗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内容为民间传说或歌颂英雄功绩的长篇叙事诗。而在《诗章》中,缺乏清晰的主题和无所不在的叙事者。

③子路答曰:“我想要整顿防务”。求说:“如果我一地之主,我将把它治理得比现在更好”。(即注重人民生活安康)赤则说:“我更喜欢有座小小的山庙,整肃礼仪,让祭祀恰如其分地举行”。而点的回答与众不同,就连回答前的神态动作也让人匪夷所思(他手指抚弄着琴弦,当手已离琴却依旧是琴音袅袅,那声音在枝叶下面飘起,仿佛轻烟):“古老的池塘,孩子们扑通扑通跃入水中,或是端坐在树丛里,弹奏着琵琶”。

④这个字是庞德自己造的,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他误以为“红”、“樱桃”、“铁锈”、“火烈鸟”这四个概念在汉语里分别是四个部首或独立汉字,而将这四个概念并置起来就是汉字“红”的真实写法。这也体现了庞德的意象并置理念。

⑤即“合理的措辞”。

⑥即“合理的价格”。

参考文献

- [1] NADEL I B.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zra Poun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5.
- [2] BECKETT L. Wallace Steven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64.
- [3] HARTMAN G. Beyond Formalism[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358.
- [4] POUND E. The Cantos[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5.
- [5] POUND E. PAIGE D.D.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Ezra Pound 1907—1941[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0.
- [6] SCHAFER R M. Ezra Pound and Music[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7:98.
- [7] DOOLITTLE H. Norman Holmes Pearson and Michael King ed., End to Torment: A Memoir of Ezra Pound[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9:71.
- [8] POUND E. Pavannes and Divagations[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4:102.
- [9] COOKSON W. Selected Prose, 1909—1965[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3.
- [10] POUND E. Jefferson and/or Mussolini[M]. New York: Liver Right, 1970: 128.

(下转第86页)